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

媒介素养教育论

袁军 著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

媒介素养教育论

袁军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A Discussion
on Media Litera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素养教育论/袁军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81127-486-8

I. ①媒… II. ①袁… III. ①传播学: 教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7601 号

媒介素养教育论

著 者 袁 军

责任编辑 刘大年

封面设计 魏 东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201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486-8/G·48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前言

193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 F. R. 利维斯(F. R. Leavis)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 Thompson)出版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率先提出并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同一时期,丹麦的教育工作者开始了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推广活动。

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初提出,是从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抨击以大众媒介为滋生土壤的流行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培养公众特别是鉴别能力尚不健全的青少年对媒介的批判意识、对媒介负面功能的抵御能力。

从媒介素养教育概念提出到现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媒介”到解读、批判媒介,认同、运用媒介的认识过程;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则经历了一个从开始的学界呼吁,发展到政府号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的学校课程体系,媒介素养教育被视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

国外涉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散见于传播学(主要是批

判学派)、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符号学等众多学术领域。由于大众传媒被视为大众文化的策源地和载体,因而,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英国文化研究紧密关联。例如,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从最初鼓励学生“抵制”、“抗拒”的“保护主义”,发展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传媒理解力”和“媒介参与力”的“超越保护主义”的过程,直接源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立场的转变。可以说,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教育的首倡者 F. R. 利维斯被视为早期文化研究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更被作为一种实践模式和社会运动加以推广。许多国家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协会”、“俱乐部”乃至国际组织,出台“实施计划”,开展社会性的“教育运动”。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部分大、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 1960 年代以来也为媒介素养教育做了积极的努力。1978 年出台了“媒介素养教育方案”,1982 年、1984 年、1986 年和 1992 年又相继出版了《将大众媒介用于公共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最后报告》、《媒介教育》、《了解媒介:媒介教育与传播研究》、《全球传媒教育的新趋势》等四种读物,并在 1989 年发表的《世界交流报告》中,设专节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国际趋势和几大洲的媒介素养教育状况做了介绍。

二

在中国,虽然早在西方学者系统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 1930 年代前后,一些新闻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就对新闻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以及在中小学开设新闻学课程进行过阐述,但是,以培养公众的评判意识、抵御媒介负面影响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属于舶来品。

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先行一步。香港许多机构和团体,如香港突破机构、香港传媒教育协会等积极开展社会运动,推广媒体素养教育。2002 年,台湾发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标志着台湾的媒介素养

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大陆,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比较系统地探讨媒介素养教育问题。1997年,《现代传播》杂志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的文章《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此后,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2004年,“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被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4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设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专业网站“媒介素养研究”。

总的来看,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推广都开始起步并有一定积累:一是除对国外文献的介绍和引用之外,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二是缺乏对转型期我国媒介环境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媒介素养研究与实践推广紧迫性的深入研究;三是虽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已开始探讨如何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但仍未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四是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相对滞后,亟待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传播环境和媒介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已成为公众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以及形成和影响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媒介的产业化经营导致的媒介商业化倾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媒介负面影响凸显,而批评的声音却显得零散和微弱。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理性地辨别媒介、参与使用媒介的能力,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教育界的迫切任务。

选择“媒介素养教育”这样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拓宽学术视野,澄清认识误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优化我国媒介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

本书力求搭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框架,着力回答四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二是为什么要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其

理论依据是什么;三是我国为什么要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四是我国怎样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与此相对应,本书分为四章或四个部分——“媒介素养教育概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意义”、“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背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途径”。

本书的思路架构和论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发展、定义、内容和实施途径。

媒介素养教育的最早提出是在1930年代前后,当时正值电影、广播等视听媒介的兴起和发展普及时期,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以视听媒介为土壤和载体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精英文化交锋、冲突的必然结果。

媒介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和影响也不容忽视。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的最初动因,正是在于因视听媒介发展而兴起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在于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媒介素养教育,其内容与目标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而做出调整甚至转变,但是,培养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负面影响的反省能力和抵御能力,始终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和重点。

媒介素养是指社会公众认知媒介、参与媒介、使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是以社会公众为对象,以培养和提高认知媒介、参与媒介、使用媒介能力为目的的素质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素质教育,这意味着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推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构建以多主体、多途径为核心的制度化、社会化媒介素养教育系统,是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从学理层面揭示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致力于搭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框架。

本书广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新闻学、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

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理论资源的整合,从理论层面揭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动因和意义。其理论框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媒介环境”有别于“现实环境”。

媒介环境是介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物”,是“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①

最早对“媒介环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李普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环境。“两个环境”理论揭示了大众媒介反映客观世界和媒介信息作用于社会公众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动因提供了理论视角和依据。

信息时代普遍存在着“拟态环境的环境化”^②趋向,人类习惯于在“媒介环境”或“信息环境”中生活,甚至习惯于把“媒介环境”视为“现实环境”,因此,“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大众媒介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媒介负面功能的种种具体表现,还是媒介作为形成“刻板印象”的最重要途径,都反映出大众媒介发挥社会功能的“双刃剑”特征。

二是“媒介环境”有别于“现实环境”的根源。

“媒介环境”有别于“现实环境”,“媒介环境”是“现实环境”的“建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媒介怎样建构“媒介环境”?谁在左右媒介的传播行为?哪些因素影响着媒介“建构”“媒介环境”?本书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① [日]内川芳美:《信息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55页。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② 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观点。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所谓“内在”因素角度,是从媒介信息传播过程本身,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媒介内在运行规律对媒介内容传播的影响,回答“大众媒介怎样‘建构’‘媒介环境’”这一问题。本书运用“把关人”、“议程设置”以及传播符号对“编码”的影响等理论,分析了媒介信息传播流程的各个环节对“建构”“媒介环境”的影响。

所谓“外在”因素角度,即考察国家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制约,回答“哪些因素(谁)在影响媒介‘建构’‘媒介环境’”、“谁在设置媒介议程”、“谁在掌控着媒介‘把关’”等问题。

(3)分析中国现阶段特殊的信息环境和媒介环境,系统阐述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选择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特定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既是研究的初衷,也是全部研究成果的归宿。

我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着整体性社会结构变迁。这种社会转型对大众媒介发展、传播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是我国传媒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黄金发展机遇,成为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最迅猛的行业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介大国,大众媒介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空前提升。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 WTO 以及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我国面临信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传播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传播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家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的现实问题。

三是我国大众媒介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众媒介走向市场,即开始市场化进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集团化、产业化改革的迅速推进,在迅速壮大我国传媒业整体实力的同时,也使媒介负面功能日益凸显。

基于上述形势,培养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负面影响的反省能力和抵御能力,推广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使公众成为信息社会、“媒介化时代”媒介信息“清醒”、“自觉”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

(4)借鉴国外(境外)媒介素养教育经验,结合我国信息环境和媒介环境,以及公众媒介素养实际,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

了解公民媒介素养状况,是探索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和途径的基础。一系列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基本媒介素养大多属于自发养成,未达到理性的自觉层面,而且与我国不同地域、阶层、职业的整体素质、媒介接触和信息化水平差异大,存在非常显著的信息鸿沟的特点相一致,公民媒介素养整体呈现不平衡状态。

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属于舶来品,采取西方经验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建构符合国情、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是实践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原则。同时,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必须强调“防御”与“建设”、“保护主义”与“非保护主义”相结合,树立全民素质教育的理念,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终身教育、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形成全民性、大众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多主体、多对象,各环节、各因素相互配合、良性互动,是推广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条件和有效途径。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学术问题,但更是一项社会事业。应在观念启蒙、形成共识的同时,有选择、分重点地开展实验,累积经验、逐步推广,以形成学术研究与实践推广有机统一、理论认识与实务经验良性互动的格局。

四

如前所述,“媒介环境”有别于“现实环境”,媒介不仅“反映”和“展现”客观世界,而且“再现”和“塑造”社会现实。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就是解构这些隐藏在媒介信息背后的机制,让学习者了解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媒体面貌的原因。

探讨和解构媒介信息背后“建构”社会现实的内在机制,是信息时代众多学

科领域共同的“兴趣点”。正因为如此,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广泛涉及传播学(主要是批判学派)、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教育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学术领域,具有广阔的学术背景。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本书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的多元开放性,需要采用多角度、多层面、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一是文献分析方法。本研究尽量充分地占有中外媒介素养教育相关学术文献资料,采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进行整理归纳,在客观、科学地分析的基础上,获取与本研究论点相关的素材,力求文献资源的完整、权威、准确,以及与本研究的贴切、匹配。

二是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属于舶来品。毫无疑问,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内容和推广经验模式,对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推广具有借鉴价值。在信息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关起门来搞媒介素养教育是不可能的,但一味采取拿来主义显然也行不通。本研究采用比较的思维和方法,在立足国情思辨探索问题的同时,十分注重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先进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坐标中确定中国的相关位置,于比较中寻找差异,于比较中获得借鉴。

三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充满理论思辨又强调应用实践的领域,因此,本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但在涉及适宜实证研究的领域时,采用了一系列实证调查的数据和成果,以求描述、论证的精准性,增强说服力。

四是多学科理论整合分析方法。媒介素养教育广阔的学科背景,以及推广实践过程中涉及面的广泛和复杂,决定了本研究必须采取多元开放式的研究思维,强调多种学科、多种理论的交叉与整合。本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广泛运用了新闻学、传播学(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社会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集多学科成果,审视、分析、聚焦媒介素养教育问题。

目 录

前言 /1

第 1 章 媒介素养教育概说 /1

第一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缘起和发展 /1

一、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提出 /1

二、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开展 /4

三、我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 /20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 /33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 /34

二、21 世纪的媒介素养教育 /41

第三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46

第四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54

第 2 章 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意义 /64

第一节 “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 /67

一、媒介传播与“媒介环境”	/67
二、“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	/72
第二节 媒介的负面功能	/80
一、媒介负面功能的具体表现	/81
二、媒介负面功能与刻板印象	/85
三、媒介负面影响的规避	/89
第三节 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在因素	/91
一、把关与“建构”	/93
二、议程设置与“建构”	/102
三、传播符号与“建构”	/106
第四节 影响媒介传播的外在因素	/110
一、影响媒介传播的国家和政治因素	/111
二、影响媒介传播的经济因素	/128
三、影响媒介传播的社会因素	/134
 第 3 章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背景	/136
第一节 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媒介状况	/136
一、改革开放时期(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	/137
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时期(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	/141
三、加入 WTO 以后(2001 年至今)	/143
第二节 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信息传播环境	/146
一、信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146
二、我国的对策	/152
第三节 我国媒介的市场化进程	/165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媒介的市场化尝试	/165

二、新时期我国媒介的市场化进程 /167

第四节 媒介的负面影响 /173

一、媒介的负面表现 /175

二、遏制媒介负面影响 /179

第 4 章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途径 /185

第一节 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状况 /186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 /188

二、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状况 /195

三、农民媒介素养状况 /201

四、小结 /203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立的原则和理念 /204

一、防御模式与建设性模式(或“保护主义”与“非保护主义”)
相结合 /205

二、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206

三、树立全民素质教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 /207

第三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 /210

一、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架构的建立与运作 /210

二、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设计与课程模式 /214

三、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养与继续教育 /216

四、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推广 /216

参考文献 /220

第 1 章

媒介素养教育概说

第一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缘起和发展

一、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最早由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1930年代提出。193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 R. 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出版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首次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同一时期,丹麦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开始倡导并尝试在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讲座,以培养学生对正在普及的电影、广播等视听媒介的欣赏和判断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出,有其社会根源。自大众传媒特别是视听媒介出现后,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

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出现,众多青少年沉溺其中。据统计,1922 年,美国每周进入电影院的人数达 4000 万,1920 年代末,达 9000 万,1929 年看电影的观众中有约 4000 万青少年,其中约 1700 万是 14 岁以下的儿童。^①而电影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主题是关于爱情、性和犯罪的。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电影对青少年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产生什么影响。从 1929 年开始,一批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学者们采用了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实证方法,其研究结果《电影和儿童研究摘要》于 1933 年发表,其中包括《电影和儿童的社会态度》、《电影和道德标准》、《电影内容分析》、《电影与青少年犯罪》等 13 项专题。这就是传播学史上著名的“佩恩研究”。“佩恩研究”拉开了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序幕,也开启了传播学密切关注大众传媒、大众文化、青少年成长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传统。

媒介素养教育的最早提出,不是在率先关注媒介效果和媒介对青少年影响的美国,而是在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英国。如果说,美国学者的“佩恩研究”是站在传者的立场,从大众传播效果,特别是从负面效应的角度探究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揭示其作用的内在机理的话,那么,英国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则是从维护传统文化的角度,关注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前景深感忧虑,从而致力于提高受众的“免疫力”,以抵御媒介的负面影响。

利维斯是英国一位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英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代表

① Shearon A. Lowery & Melvin L. De Fleur:《传播研究的里程碑》,王嵩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版,第 49 页。转引自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人物。以他为代表的《细绎》(Scrutiny)^①集团十分关注 20 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大众文化兴起和流行的现象。《细绎》杂志刊载了许多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文章并出版了相关著作,利维斯和汤普森的《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就是代表性著作之一。此外,利维斯夫人(Q. D. Leavis)所著的《小说与阅读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1932)一书,专门研究了广告与通俗小说问题。利维斯的《细绎》集团极力倡导文化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这批学者影响广泛,其所代表的这股思潮后来被称为“利维斯主义”。利维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都是保守的。他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文化衰落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在他看来,一种有机和谐的社会秩序仅仅存在于 17 世纪之前,它遭受到工业革命的破坏。利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诊断的那样,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作为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流行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和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将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此必须“训练公民区分与抵制”。^② 利维斯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站在这一立场,利维斯和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一书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做了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他们从保护主义立场出发,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倡

① *Scrutiny* 是一本由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主办的英国文学批评杂志。汉译为《细绎》,又译为《审思》。

② F. R. Leavis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Greenwood Press, 1977, pp. 3-5.